

思想史

余英時題 

Intellectual History

專號：明清思想史

王昌偉

劉勇

張藝曦

Ying Zhang

Harry T. Dickinson

金觀濤

劉青峰

邱偉雲

David Der-wei Wang

Yoshizawa Seiichio

Jeu Jenq Yuann

5

思想史

Intellectual History

專號：明清思想史

5

2015年9月

思想史
思想史 5

2015年9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4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編 著 思想史編委會
總 編輯 胡 金 倫
總 經理 羅 國 俊
發 行人 林 載 爵

出 版 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 225
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 話 (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198號
登門市電話 (04) 22312023
台中電子信箱 e-mail: linking2@ms42.hinet.net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 (02) 23620308
印 刷 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 經 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 話 (02) 29178022

叢書主編 陳 逸 達
封面設計 沈 佳 德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57-08-4641-6 (平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思想史 5/思想史編委會編著，初版，臺北市，
聯經，2015年9月（民104年），352面，14.8×
21公分（思想史：5）
ISBN 978-957-08-4641-6（平裝）

1.思想史 2.文集

110.7

104021777

思想史第5期編輯委員

- | | |
|--------------------------|---|
| 呂妙芬
Miaw-fen Lu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
| 沙培德
Peter Zarrow | 康乃狄克大學歷史學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
| 陳正國(主編)
Jeng-guo Chen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 黃克武
Ko-wu Huang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
| 蕭高彥
Carl K.Y. Shaw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

編輯顧問

- | | | | |
|-------|-----------|---------------------|--|
| 王汎森 | 中央研究院 | David Armitage | Harvard University |
| 余英時 | 普林斯頓大學 | Peter K. Bol | Harvard University |
| 村田雄二郎 | 東京大學 | Benjamin Elman | Princeton University |
| 林毓生 | 威斯康辛大學 | Knud Haakonssen |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
| 張灝 | 香港科技大學 | Jonathan Israel |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Princeton |
| 陳弱水 | 國立臺灣大學 | | |
| 黃進興 | 中央研究院 | Nicholas Phillipson |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
| 葛兆光 | 復旦大學 | | |
| 羅志田 | 四川大學/北京大學 | | |

(依姓名筆劃排序)

目錄

【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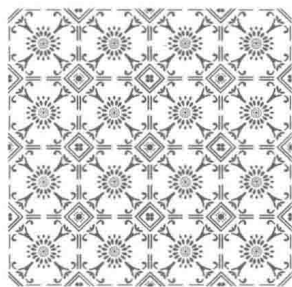
- 王昌偉 王心敬續《關學編》與康乾之際關中理學傳統的建構：
兼論清代學術的區域化進程 1
- 劉勇 晚明理學「止修」學派之宗旨與師承 39
- 張藝曦 明代陽明畫像的流傳及其作用——兼及清代的發展 95
- Ying Zhang (張穎) Confucian Principle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a
Scandal: Writing about Zheng Man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157
- Harry T. Dickinson Later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Changing British Interpretations from 1815 to
the Present 215

【論壇】

- 金觀濤、劉青峰、邱偉雲 〈《新青年》的數位人文研究〉 283
- David Der-wei Wang Talks at “New Reflections on *New Youth*:
Liberalism and Radicalism in Modern China” 311
- Yoshizawa Seiichio Political Ideals of *New Youth*: Chen Duxiu and
Republicanism 321
- Jeu Jenq Yuann Scientific Life View: Personal or Human 333

【論著】

王心敬續《關學編》與康乾之際關中 理學傳統的建構： 兼論清代學術的區域化進程



王昌偉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宋代至清代的思想史。

王心敬續《關學編》與康乾之際關中理學傳統的建構： 兼論清代學術的區域化進程

摘要

過去學者談到明清兩代學術的時候，一般傾向於把經世之學與考據學的興起視為知識界對理學的否定，並認為到盛清時期，理學基本上已失去了生命力，其地位也已被考據學所取代。這個自晚清以來就占主導地位的觀點，致使學術界在過去一百年來對清代理學的重視不夠。這樣的情況近年來已有所改變，尤其是不少從區域文化入手的研究，為我們展示了清代理學在地方上的生命力。

本文也是一次從區域入手，探討社會文化和理學義理之間的互動的嘗試。以往大多數以諸如「閩學」、「關學」、「徽學」、「湖湘學派」等等為題的研究，都把地域性的理學學派視為一不證自明的界定範疇，重點則放在分析學派成員的學術和思想。不過，這一類的研究傾向於比較草率把來自同一地區的思想家都視為同一固定「學派」的成員，而忽略所謂的「學派」，其實是一經過各種思想與學術競爭的場域。而且，在這樣的討論框架之下，地域除了提供一個便於研究者勾勒理學家的社會網絡的範圍之外，並沒有其他更為實質的意義，該地域的社會文化也因此變得可有可無，讀者一般也難以從中理解理學家的義理內涵與他們所處的特定社會文化環境之間的關係。

有鑑於此，本文將通過對生活於康熙、乾隆之際的關中理學家王心敬（1656-1738）對關學學統的重新建構，論證王心敬所處的社會環境，以及他個人對如何才算是正學的理解，如何具體影響他對關學的塑造。本文因此會採取思想史的進路，從思想家的時代、所處的地域環境、面對的思想文化傳統，以及其義理之學的內涵入手，一窺他重構一個地方學派的歷史與思想動因。

關鍵詞：王心敬、關學、清代學術、體用全學

一、前言

我們一般提起宋明理學的發展與流傳，都會以「濂洛關閩」為周敦頤、二程、張載與朱熹所代表的「學派」命名。似乎理學從一開始，理學內部就存在含有地域色彩的學派的分野。實際上，「濂洛關閩」作為一組固定的詞組出現得相當晚，大概不會早於宋末元初。¹換言之，從周子到朱子，都沒有要創立一內涵與外延皆明確的地域性學派的意圖。然而，受宋末以來傳統論述的影響，不少現代學者經常會以這幾位宋代大儒作為其「學派」的開山鼻祖，並強調某一「學派」在學術思想與學風方面的特殊性與延續性。關於這一點，從學界對關學的界定與討論中即可見一斑。如陳俊民認為：「關學是宋明理學思潮中由張載創立的一個重要獨立學派，是宋元明清時代今陝西關中的

1 這個結論是通過對《四庫全書》網絡版的搜索所得。「濂洛關閩」這個詞組最早出現於胡炳文（1250-1333）致吳澄（1249-1333）的書信，見胡炳文，《雲峰集》，卷1，〈與草廬吳先生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集部別集類，第1199冊，頁3a。在胡炳文之前的黃仲元（1231-1312）文集中，其原序雖有這個詞組，但此序實為宋濂（1310-1381）所作。見黃仲元，《四如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集部別集類，第1188冊。另外，稍早有方逢辰（1221-1291）的「濂洛關西武夷之學」之說。見方逢辰於1276年左右所寫的《蛟峰集》，卷5，〈芳潤堂記〉，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集部別集類，第1187冊，頁8b。亦有王應麟（1223-1296）和湯漢（約1198-1275）於1260年代「隣牆居，朝夕講道」時，關於「關洛建上江西」異同之討論。見袁桷，《延祐四明志》，卷4，〈絮齋袁先生〉，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史部地理類，第491冊，頁24a。由陳思編，陳世隆補的《兩宋明賢小集》記載此事，則作「比屋而居，朝夕講道，論關洛濂閩江西之同異」。見陳思編，陳世隆補，《兩宋明賢小集》，卷378，〈王尚書遺稿〉，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集部總集類，第1364冊，頁2a。

理學。」²此一學派雖無不間斷的師承，卻有獨特的學術思想的承傳，具備有別於其他學派的特點。³

然而，事實卻與陳俊民的看法有出入。儘管活動於宋孝宗時期的劉荀（生卒年不詳）已有「橫渠張先生名載，字子厚，居鳳翔郿縣之橫渠鎮，學者稱橫渠先生。倡道學于關中，世謂之關學」之說，但劉荀並沒有把橫渠之關學視為一獨立的，有別於濂學、洛學或閩學的學派。⁴更何況從金元至明初，關中學者對張載及其學術并不重視。⁵在這幾百年間，關中理學主要是程朱之學的餘緒。一直要到明中葉，才有學者開始因為張載的關中人身份，而把他的地位抬到創派祖師的高度。即便如此，晚明的關中理學最關注的，並非傳承張載極有特色的學說，而是回應朱子學與陽明學的衝突。有鑑於此，林樂昌認為我們有必要區分北宋時期及明清時期的關學：

相對於明清關學，我們還可以把北宋關學視作「原始關學」或「原生關學」，其創始人是北宋理學家張載，張載之學是此時關學學派傳承的惟一對象。而相對於北宋關學，則可以把明清關學視作「次生關學」。所謂次生關學，是指產生於「後張載時期」的關學，具體指明清關學

2 陳俊民，《張載哲學思想及關學學派》（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24。

3 陳俊民，《三教融合與中西會通：中國哲學及其方法論探微》（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236-237。

4 劉荀，《明本釋》，卷上，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子部儒家類，第703冊，頁3a。

5 關於張載在明清時期的接受史，見呂妙芬，〈明清之際的關學與張載思想的復興：地域與跨地域因素的省思〉，收入劉笑敢主編，《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第7輯，《明清儒學研究》（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30。

作為若干小學派的集合，無論其思想根源還是其傳承對象都已經不再僅限於張載之學了。⁶

在具體操作的時候，林樂昌認為應該更進一步把明清兩代的關學區分開來，那麼在關學的發展史上，就可分為北宋、明代與清代三個時期：

與北宋張載關學作為單一的理學學派不同，明代關學在朱子學、陽明學、甘泉學以及西學等時代思潮的影響下，呈現多學派共存的格局，包括三原學派、河東學派、甘泉學派，以及以王徵為代表的關學別派；清代關學則在維新運動和西學的影響下逐漸完成了向近代的轉型，從而終結了關學。這樣，就形成了關學歷史演化的三個階段，即：北宋張載創建關學階段、明代關學學派多元共存階段、清代關學近代轉型階段。在這三個不同階段的關學之間，是有較大差異的。基於從北宋關學至明清關學三個階段之間的差異性，我們對不同時代的「關學」不應當滿足於使用泛稱，將其統稱為「關學」；而應當使用特稱，將其分別稱為「北宋關學」、「明代關學」、「清代關學」。這可能更符合北宋至明清關學演化脈絡的實際。⁷

林樂昌提醒我們，宋代以還的關學並非統一的概念，研究者更應該注意不同時段的差異性，無疑是很有見地的。但林樂昌的觀點卻有兩點值得商榷。首先，林樂昌認為清代關學一方面受西學的影響，在

6 林樂昌，〈論「關學」概念的結構特徵與方法意義〉，《中國哲學史》，1（北京，2013），頁63。

7 林樂昌，〈論「關學」概念的結構特徵與方法意義〉，頁65。

晚清則更與維新思潮發生關係，經歷了近代轉型，結果促成了關學的終結。在清代「受西學影響」的名單中，林樂昌列舉了清中葉撫陝總督陳宏謀（1696-1771）的幕僚楊岫（1699-1794）。可是楊岫在清末關中學者有關關學譜系的討論中完全缺席，似乎當時有資格左右關學史的編寫的關中大儒們，都不知道此人的存在，或者是不願意讓他占有一席之地。

另外，林樂昌此處列舉了同樣具爭議性的王徵（1571-1644）作為晚明關學的「別派」，⁸也同樣存在問題。首先，林樂昌沒有說明是以什麼標準把王徵劃入關學的別派。另外，王徵是否應該被列入關學的譜系，在清代也是關中學者爭論的焦點（見下文）。這也說明雖然林樂昌注意到并不存在一個能用以概括和解釋從北宋到明清的關中學術的統一範疇，他卻仍然以關學為一不證自明的概念，所以才會直接以王徵與楊岫為關學人物，而沒有注意到歷史上關學譜系的建構者，經常都會為了如何界定關學以及誰才算是關學人物而展開辯論。

有鑑於此，筆者曾撰文考察晚明著名陝西學者馮從吾（1556-1627）所編纂的《關學編》，目的就在於說明關學其實是一個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中被建構出來的範疇。唯有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能真正擺脫以往離開歷史語境去試圖定義關學的誤區。⁹本文擬在這個基礎之

8 林樂昌，〈論「關學」概念的結構特徵與方法意義〉，頁63。關於王徵的研究，見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關於楊岫的研究，見呂妙芬，〈楊岫《知本提綱》研究——十八世紀儒學與外來宗教融合之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0（臺北，2012），頁83-127。

9 王昌偉，〈關學編與明清陝西士大夫的集體記憶〉，收入何國忠主編，《文化記憶與華人社會》（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2008），頁167-178。

上，探討入清以後，關中學者如何回應前朝前輩所建構的「關學」，以及晚明思想脈絡下被界定的學術傳統如何在清代被同一地區的學者接受、修正或改造，而這些對關學的不同詮釋又能說明清兩代思想史的什麼問題。

過去學者談到明清兩代學術的時候，一般傾向於把經世之學與考據學的興起視為知識界對理學的否定，並認為到盛清時期，理學基本上已失去了生命力，其地位也已被考據學所取代。這個自晚清以來就占主導地位的觀點，致使學術界在過去一百年來對清代理學的重視不夠。雖然有錢穆（1895-1990）因為不滿意章太炎（1869-1936）與梁啟超（1873-1929）輕視清代理學，而不無爭議地把清代三百年的學術史寫成一部理學史，¹⁰專門討論清代理學的著作仍然是鳳毛麟角。

不過這樣的情況近年來情況已有所改變。2007年出版的《清代理學史》一書共三大冊，極其詳盡地介紹了有清一代理學的發展狀況。¹¹此書的作者認為，清代的理學的衰微主要是體現在缺乏理論上的創新，而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理學則通過科舉考試，繼續在士人社群中發揮作用，並深刻影響他們的社會和文化活動，即使是在漢學大行其道的盛清時期，理學的社會影響也從來沒有間斷過。因此，本書的第二冊就特別用了一章來討論理學與社會文化的關係。其中，作者更以徽州作為個案，探討理學與區域社會的關係，從「民間的朱子崇拜、宗法觀念的盛行、對婦女的束縛、儒與商的結合」等幾方面論

10 關於錢穆如何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著作中特意褒揚理學而貶低考據學，見姜虹，〈錢穆清代理學觀論述〉，《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北京，2013），頁20-26。

11 龔書鐸主編，史革新、李帆、張昭君等著，《清代理學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

證理學的鄉土化和社會化，也兼論及徽州理學的獨特性的問題。¹²雖然由於篇幅所限，本書對理學與區域的關係的討論還不夠深入，也沒有完全擺脫過往以「進步／落後」的二元框架來分析理學的社會作用的成見，但此書的貢獻不可抹殺，也與近年來某些針對區域性理學學派的研究，共同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清代理學的新視角。¹³

本文也是一次從區域入手，探討社會文化和理學義理之間的互動的嘗試。以往大多數以諸如「閩學」、「關學」、「徽學」、「湖湘學派」等等為題的研究，都把地域性的理學學派視為一不證自明的界定範疇，重點則放在分析學派成員的學術和思想。這一類的研究傾向於比較草率把來自同一地區的思想家都視為同一固定「學派」的成員，而忽略所謂的「學派」，其實是一經過各種思想與學術競爭的場域。¹⁴而且，在這樣的討論框架之下，地域除了提供一個便於研究者勾勒理學家的社會網絡的範圍之外，並沒有其他更為實質的意義，該地域的社會文化也因此變得可有可無，讀者一般也難以從中理解理學家的義理內涵與他們所處的特定社會文化環境之間的關係。

有鑑於此，本文將通過對生活於康熙、乾隆之際的關中理學家王心敬（1656-1738）對關學學統的重新建構，論證王心敬所處的社會環境，以及他個人對如何才算是正學的理解，如何具體影響他對關學

12 龔書鐸主編，史革新、李帆、張昭君等著，《清代理學史》，中卷，第6章。

13 傅小凡、卓尅華主編，《閩南理學的源流與發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放寧，〈理學地域化傳行過程中的異變：論清代嚴州地區理學的復興〉，《江蘇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3（江蘇，2012），頁64-68。

14 近期學界已更為重視「學派」作為競爭場域的現象。代表作可參閱劉勇，〈中晚明理學學說的互動與地域性理學傳統的系譜化進程〉，《新史學》，6：2（臺北，2010），頁1-60。

的塑造。¹⁵本文因此會採取思想史的進路，從思想家的時代、所處的地域環境、面對的思想文化傳統，以及其義理之學的內涵入手，一窺他重構一個地方學派的歷史與思想動因。

二、從王心敬的〈家訓〉看清初的關中社會

王心敬，字爾緝，號豐川，陝西鄠縣人。王氏為當地甲族，自明中葉身列「前七子」的著名文人王九思編修了第一部族譜，雖經歷了各種天災人禍，包括明清鼎革的混亂局面，王心敬到了康乾時期仍能在一定程度上維持宗族的格局，人數幾五百人，讓王心敬能夠為族譜進行第四次的編修。¹⁶儘管如此，王心敬的日常作業基本上還是以家為單位。根據王心敬在為告誡其家中子弟所寫的〈家訓〉中的自述，他十歲喪父，七年之後，其伯父亦復見背，遺下兩個年幼的弟弟，以及一個「愚痴」的僕人。禍不單行的是，在他伯父去世那一年，三藩起兵，於是他「以從未更事之孱軀，上應供軍百需，下有饑寒債負」，家計窘迫，隨時有覆墜的可能。幸好有老母「明晰大體，主持家政」，不但把諸事處理得井井有條，還為王心敬提供了一個能安心

15 目前學界對王心敬的研究還在起步階段。以王心敬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專著，只有幾部近幾年完成的碩士論文。單篇論文也寥寥可數，且主要集中在探討其易學。見張東鴻，〈王心敬《豐川易說》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第1章〈緒論〉，頁1-13。未被列入張文的學位論文包括王振，〈王心敬《豐川易說》思想新探〉（山東：山東大學系所名稱碩士論文，2013）。

16 王心敬，《豐川全集》，續編卷18，〈族譜世系後跋〉、〈四修族譜後序〉，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集部別集類，第278冊，頁784。一直到今天，王氏仍然維持著宗族的凝聚力，他們最近一次的修譜（第12修）在1996年。見榮恩主編，《王氏族譜》（西安：鄠縣文管會，1996）。

讀書的環境：

每午夜擎燈，伯母、老母東西對績，余於其前就燈親書，往往雞鳴未已。次年余補邑庠弟子，又次年，食餼。農事漸理，仲弟亦長。七、八年間，遂得立腳不傾，稍成人家……今老母年且逾七望八，余亦年五十而往。兩弟四子三姪三孫，以及子婦孫女僕婢孕息者五十多人。且幸梟獍未生，長舌弗作，老母家教整肅，每以張、陳、陸、鄭十世同居為訓。終余之身，當無盪析之虞。¹⁷

這段敘述透露出幾個重要的訊息。首先，與我們從其家中有一僕人，以及王心敬無須照顧營生，可專心讀書的情況可見，即使在經濟最為拮据的時候，王家也有能力供其優秀子弟讀書。另外，王心敬的父親和伯父到了成家以後顯然沒有分家，所以才會有伯父見背之後，王心敬需要扛起家庭生活經濟重擔的情況，也才会有伯母、老母夜晚共同督促他讀書的場景。此一傳統也由王心敬這一輩繼承下來，才會發展至全家五十多人而仍無盪析之虞的盛況。因此，王家的組織形式屬於我們所謂的「擴展家庭」(extended family)。

王家主要的經濟來源是甚麼？根據所謂「每午夜擎燈，伯母、老母東西對績，余於其前就燈親書，往往雞鳴未已」的敘述，以及周元鼎（生卒年不詳）在刊印王心敬所續的《關學編》時增補的豐川傳記所敘，心敬後來放棄舉業從學李顥（1627-1705）時，「一切需用皆母紡績質產所供」，¹⁸似乎家庭式的紡織作業是其家重要的經濟活動之

¹⁷ 王心敬，《豐川全集》，正編卷26，〈豐川家訓自敘〉，頁594。

¹⁸ 馮從吾撰、王心敬續修、周元鼎增修，《關學編》，卷6，〈豐川王先生〉，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集部別集類，第515冊，頁241。

一。另外，從王心敬補邑庠弟子、食餼，以及家中「農事漸理」的七、八年間即「稍成人家」的情況可知，從耕、讀所得之收入，才是最主要的經濟命脈。因此，在〈家訓〉中，王心敬對家族的經濟活動做了如下的規定：

教子弟者，最上教之讀書出身。行志達道。如不能取科第，則教之耕讀相資爲上。不得已而有事以資農耕之不足，則使之教學作幕，亦無不可，但作幕非大有主見，人易於失其所守，尚不如教學之無弊。如更不能教學作幕，則醫藥種樹畜牧亦尚切實可爲。但醫非明理，易至殺人，終不如畜牧種樹，不至無實欺世。至若居市貿易，則最易喪人誠慤之心。古人雖四民並列，然終非傳家教子良法，切不可教之使爲。¹⁹

明清時期的關中巨富，主要都是從事追求利滾利的商業與放貸活動的家族。²⁰但這一類追求財富的方式，卻與王心敬所憧憬的理學理想人格格格不入，因此不獲得他的認同。對王心敬而言，最理想的，莫過於培養家中子弟通過讀書入仕，把所學到的聖人之道付諸實踐。但在科舉考試競爭異常激烈的情況下，考取功名不易，如應試不成，則應教子弟邊從事農耕邊讀書。如若還有經濟上的困難，則可考慮教書、充當幕僚，或者學醫，或從事種植、畜牧業。王心敬對這類非一般「士君子」所屬意的營生方式不鄙視，究其原因，實與當時關中的經濟生態不無關係。一些研究該區域的經濟史學家指出，中國共產黨二十世紀中葉試圖在關中進行土地改革時，就發現明清以來「關中無

19 王心敬，《豐川全集》，正編卷27，〈家訓中〉，頁604。

20 田培棟，《明清時代陝西社會經濟史》（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128-130。

地主」。此一結論雖過於絕對，但仍然點出了關中農業生產模式的特色。基本上，明清以來，「關中幾乎是個自耕農的社會，地權極為分散，地主不是沒有，但確實很少。」一般擁有土地者的經營模式不是租佃而是雇工，許多本身也會參與勞作。²¹因此，受限於經濟條件，關中的地主階層如不投入其他更易獲利的營生方式如經商或放貸，其財富必然有限。

根據王心敬對其家族的敘述，王家顯然也是屬於這類雖算富戶，但卻不十分殷實的地主家庭。這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影響了他對理學的實踐問題的思考。例如在禮制的問題上，王心敬為其家族做了如下的規定：

禮無所不在，何獨於四禮而謹諸？謂四禮生人之最切近也。禮貴得中，即吾夫子亦曰：奢則不孫，儉則固矣，又何容偏取於儉而尚焉？謂儉之尚近於本，而抑且中材下士可企而及也。然維昔吾夫子不又有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與其不孫也，寧固耶？夫吾夫子豈不知禮之貴中哉？正以儀文繁縟非並禮之本始，失之即且有病其繁而畏難不行者，故寧儉寧固之嘆，吾夫子一言之不已，而至再再言之不已而直至於三。嗚呼！味斯言也，吾夫子殆隱有溯本之深思，挽時之隱意存焉。余家世業耕讀之家也，崇質尚樸，莫儉為宜，而敢妄希當世大雅之林，用避固陋之誚哉？故暇日就前代傳來家禮纂本，更為刪其繁縟而題曰《四禮寧儉》，蓋區區愚見，首取其於文不繁為近本，

21 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頁44-68，引自頁53。